



# 爱深情重忆钱宁

访龚维瑶先生

北京  
晓雨

他躺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安详地睡了，永远不会再醒来……

洁白的被单四角，不知是谁撒下了几片飘着清香的黄色菊花瓣儿。

低沉悲壮的哀乐萦绕着整个灵堂。前来向他作最后告别的人们，有副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一级的领导同志；有国内最富盛名的老科学家；有同他五十年代一起回国的学者，也有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建国以后第一代水利科学的博士研究生……

敬重与爱戴、悲痛与怀念的感情交织成一曲感人泣下的乐章，人们怎能忘记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位把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无私地献给祖国水利事业的著名科学家。

他，就是钱宁同志。

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钱宁同志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和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他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修养与开拓精神的科学家。他继承与发展了美国著名学者H·A·爱因斯坦

泥沙运动力学理论体系，倡导了高含沙水流运动机理的研究，对开拓我国的河流动力学与地貌学结合研究河床演变起了重要作用。他用毕生精力系统总结了当代国内外研究成果，写成了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泥沙运动力学》与《河床演变学》。他对黄河、长江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河流泥沙研究工作卓越的组织者之一，为培养科研骨干力量及推动国际泥沙界的研究合作，做出了巨大努力。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科学家的事迹，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专程去清华园采访了钱宁同志的夫人龚维瑶先生。

龚先生在钱宁生前工作和读书的房间接待了我。

这是一间简朴的书房。靠北墙摆放着两个书柜，装着中外科技图书；西面靠里是一个卡片柜，靠外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台录音机。龚先生告诉我，那就是钱宁病重期间用来口述录音，然后请人整理而写成《河床演变学》的录音机。

我随龚先生坐在靠东北面的转角沙发上进行了长谈。

那时，她去郑州参加钱宁悼念活动刚刚回来。钱宁同志生前为我国河流泥沙问题的研究，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病危时，还在为黄河、长江的泥沙问题操劳，身后愿将骨灰撒在黄河，以表达自己的遗愿。龚先生告诉我，钱宁的骨灰一部分已经撒在黄河里，一部分将安葬在邙山上。

当我请龚先生谈谈钱宁同志生前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高尚的道德情操时，她谦虚地笑笑说：“要不是看到钱正英部长的怀念文章和这次去郑州参加悼念活动，我还没有那么多东西告诉你呢。”

**“这里再好，我们也是客人。  
而那边却是我们的家！”**

一部像册，也许是一个家庭历史与现实生活瞬间的记录吧。我一边倾听龚先生的谈话，一边翻阅着那三本记录着她和钱宁共同生活的留影。她指着几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说：“你看，这张是钱宁青年时代在美国的照片，这张是他在美国实验室的工作照片，这张是……”啊，我看到了，那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青年，挺胸站在大海岸边，抬头向东方深沉地凝望，任海风吹拂着他的黑发……

龚先生说，钱宁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报效祖国。他一九四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系。一九四七年赴美国留学，一九四八年获美国阿华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五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爱因斯坦教授曾对不少人说过钱宁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在泥沙研究方面师承爱因斯坦教授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当时，他已学有成就，发表了不少论文。但他向往着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向往着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黄河。他深知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唯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才能大展其才。他对很多青年人说过，中国河流的泥沙问题是最丰富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他决心回到国内来。他的回国，不仅仅是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已享有的学术地位，是冲破重重阻力，甚至是冒着被投入监狱的危险。那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中美双方处于对立局面。一批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希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东部和西部的学者们经常利用假日串联起来，商定由谁出面，给周恩来总理、给美国总统或给名人报界写信，公开争取回国；谁又暂时不能出面，准备营救因公开露面而有可能被捕的

人员。一次，美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闯入我们家中，先是以提升教授来利诱钱宁，不成，又逼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去。”钱宁和我都坚定地回答：“这里再好，我们也是客人。而那边却是我们的家！”

就这样，我们一批中国学者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那是一九五五年。

**“我不同意社会上有些人的观点，  
我确信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真理。”**

龚先生告诉我，钱宁同志抱着满腔热情回国之后，便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创建泥沙实验室，培养泥沙科研队伍，到黄河上去查勘……。正当他继续施展自己的抱负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六四年的“四清”，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潮一次又一次地干扰着他的工作，到后来竟连自己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行动也不被承认了，反被诬陷为“美蒋走狗”，无辜被下放干校，关进“牛棚”，接受“批判”。这使本来性格开朗，坦率真诚，敢于暴露思想的钱宁变得忧愤而沉默了。有一件事对他刺激很深，在三门峡基地办学的时候，因为他帮助一位工农兵学员修改了一篇试验报告，而受到工宣队的反对。那天，他正巧走过工宣队的办公室，在窗外听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政治上已专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现在他们又要在业务上来专我们的政了。”听了这些话，钱宁难过地掉下了眼泪，他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连教学的权利都失去了。

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使钱宁养成了严格的务实精神，对待政治问题，他也仍然是取这种态度。

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他感到，虽然我们的国家受到了严重的

创伤，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我们的民族还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原因之所在，就是因为党有力量。

他记得，一九五九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拔白旗”的风，也有人声言要批判水科院（钱宁同志当时的工作单位）的学术权威。但当时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张子林同志却顶住了。这使钱宁同志十分赞赏，他说：“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

他记得，一九六四年他代表水科院向周恩来总理亲自汇报工作的情景，总理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以及他对水利情况掌握得如此熟悉的程度都使钱宁钦佩不已。

他记得，就在他下放干校，动身的前一天晚上，已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张子林同志找到家里说：“这不是党的政策，这种做法不能代表党。我们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们是会回来的！”

他还记得，一九八〇年，正当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的说法时，方毅同志代表党中央在接见早期回国的留美学界时说：“那些来访的华裔学者是我们的客人，对客人是要待之以礼的。而你们不同，你们是同我们一起经过风雨、共过患难的自己人。”

听了这些话，钱宁激动得不得了。他说：“党是理解我们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科学春天的到来，都使钱宁的思想境界不断升华……

新旧两个中国的对比，中美两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对比，使他愈发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个信念产生了：“我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向前来看望他的钱正英同志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不同意社会

上有些人的观点，我确信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真理。”

一九八一年，他被光荣批准入党。那时，他的癌症已属中期，完全治愈的希望不大。为了赢得有限的时间，他在工作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北京市委表彰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 “他去了，却将爱永远留在我心里”

我在同龚先生谈话的时候，她虽然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以便使所谈的内容具有连贯性，但是说到激动处，还是常常用手抹去涌出的泪水。

她说，在国外，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回到国内，由于工作关系，钱宁一年要有大半时间到野外查勘，特别是到黄河去的时间最长。我知道他是干这个事业的，不出去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从来没有阻拦过他，非要他守在我身边不可。可是每次他出差真的要走时，我还要掉泪呢。每次他回来，我的一件大事就是把他带回来的脏衣服大洗、大烫、大煮一番。因为闹了虱子，不这样处理就没有办法消灭掉。

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十年动乱中那些日子。那时他被关进了“牛棚”，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见到送点咸菜去的小女儿。当时，孩子才七岁。他患了高血压病和神经衰弱症，我便让人带去一些安眠药。后来，他才告诉我，那些安眠药，他一片也没有吃，都偷偷丢进了厕所。说到这里，龚先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钱宁是一个感情丰富、精神生活充实的人。他喜欢古典音乐，也很爱读小说，龚先生至今还能回忆起他们每逢周末同家人、朋友或青年学生一起度过的那些欢快的夜晚。

龚先生抬起头来，怀着一种若有所失的心境说，钱宁生前跟我说过好多回，等闲暇了，陪我到各地走走，到名山大川去欣赏壮丽景色，而我们的愿望一次都没有实现过，他太忙了，走得太早了……

龚先生接着说，他得了癌症以后，曾经对我说过：“过去想好好工作，没有条件。现在条件变好了，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了，可没想到我这身体又成了这个样子。”听了他这些话，我的心都快碎了。

钱宁惋惜的不是自己生命的短暂，而是他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龚先生说，在美国时，他就立志要写一本泥沙运动力学的书。提纲都写出来了，还得到了导师爱因斯坦的称赞。然而，十年动乱，夺去了他多少宝贵时间啊！得了这种病，他知道来日不会太长了，便下决心要著书了。龚先生是搞心理学的，她知道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她的理解与支持。只要在他的治疗上，她首先信心十足，对他来说，便是莫大的精神支持。所以，在他面前，她极力表现出有办法的样子，从来不给他精神上增加一点负担。他是一个硬汉子，一直同癌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至于最后连医生都吃惊他是如何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

钱宁在病魔面前是乐观的。我在像册中发现了他们夫妇俩在颐和园的几张合影。龚先生说，有一张她和钱宁共同签了名送给钱部长了。钱部长在她的怀念文章中特地提到了这件事，並写了几句话：“一对夫妇坐在长椅上，笑得多么开朗！人们会以为他们在享受着生的欢乐，决不会想到他们正在迎接死的挑战。”

钱宁同志在最后的日子里，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说话已经很困难。龚先生说，我长时间守护在他身边，他伸出那只瘦弱的手，一会摸摸我的手，一会儿又抬起来，摸摸我的面颊，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看着，看着……

我被他们夫妇间这种比金子还珍贵的爱情感动了，心里一阵难过，泪水禁不住淌了出来。

采访结束了，我站起身来，向着钱宁同志的遗像，深深地埋下头去……

窗外，是一片银色的世界，雪停了。清华园显得静穆而庄严。当我踏上被白雪覆盖的归途时，蓦地，想起了向钱宁告最后一别时，看到的那几片飘着清香的黄色菊花瓣儿……

